

新境界、新视界、新见解：吴笛对外国文学研究疆域的拓展与创新

New Realm, New Vision, New Opinion: Wu Di's Expansion and Innovation on the Frontiers of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周启超 (Zhou Qichao)

内容摘要：围绕着经典“何以生成？”“怎样传播？”这两个核心追问，吴笛率领 8 卷集《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研究》的作者们考古发掘一般地勘探经典作品或经典文学样式的生成机制、清理它们由原生地到次生地的传播路径。将经典的生成与经典的传播这两个论题域打通，便使得外国文学经典研究得以超越静态的、平面的、单纯的文字文本解读，而进入将文学文本与其跨媒体的艺术“译本”，与其文化密码加以系统化的深耕。这一深耕，对于越来越边缘化的外国文学学科具有战略性意义，它在护卫学科的生存空间，更在拓展学科的疆域。它使我们的外国文学走向“不再是外国的文学”而融入中华民族现代化进程的新境界。这一新境界的生成则得益于吴笛的“大翻译观”。“大翻译观”这一方法论创新的轴心，作为新视界，贯穿“经典生成、经典生长、学科生存”这一“三生研究”全过程，在深层统率 8 卷集的总体设计，在引领 8 卷集里吴笛本人在其一系列堪称样板的个案研究中取得具有突破性的新见解。

关键词：外国文学学科；生存与发展；经典研究；生成机制；传播路径；大翻译观

作者简介：周启超，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现代斯拉夫文论与比较诗学。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世界文学基本文献的整理、翻译与研究”【项目批号：24&ZD242】阶段性成果之一。

Title: New Realm, New Vision, New Opinion: Wu Di's Expansion and Innovation on the Frontiers of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Abstract: Centered around two core questions “How is a classic generated?” and “How is it disseminated?” Wu Di leads the authors of the 8-volume monographs *Studies in the Form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Foreign Literary Classics*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the generation of classics or classical literary styles, and

to unravel the paths of their dissemination from primary to secondary sites in an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By linking the two thematic areas of classic generation and classic dissemination, the study of classics in foreign literature can go beyond the static, flat and purely literal interpretation of texts and enter into the systematic cultivation of literary texts and their cross-media artistic “translations” as well as their cultural codes. This deep cultivation is of strategic importance for the increasingly marginalized discipline of foreign literature, which defends the survival space of the discipline and expands its boundaries. It enables our foreign literature to move toward the new realm of “no longer a foreign literature” and be integrated into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creation of this new realm is attributed to Wu Di’s “Great Translation View.” The axis of methodological innovation of the “Great Translation View” as a new vision runs through the whole process of “classic generation, classic growth, and disciplinary survival,” which is the “three lives of research,” and governs the overall design of the Eight Volumes of the monographs. The overall design of the 8-volume monographs leads Wu Di himself to make breakthroughs in a series of case studies that can be regarded as models.

Keywords: foreign literatur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classic studies; generation mechanism; dissemination path; great translation concept

Author: **Zhou Qichao** is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Literatur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His academic research focuses on modern Slavic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poetics (Email: zhouqichao88@126.com).

在四十年来的学术探索中，吴笛不但出色地继承其师力冈、飞白、陈坚的衣钵而成为一位优秀的多语种翻译家、多语种的外国文学研究者，更成为一位杰出的外国文学研究组织者、外国文学学科建设者。进入新世纪以来，吴笛不但一直在引领浙江大学和浙江省外国文学学科的发展，而且率领团队进入经典生成基因的勘探、经典生长路径的深耕，来拓展当代中国外国文学的生存空间，使我们中国学者视野中的外国文学走向“不再是外国的文学”的新境界，使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作为文化资源而走向有机地融于三个历程——中华民族思想解放的历程、中华民族精神成长的历程、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进程——的新境界。

一、新境界

外国文学研究这一新境界集中地体现于吴笛领衔主编并担任团队主力，以十年的时光来精心打磨的《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研究》8卷集（下文简称为8卷集）。

用“精心打磨”来形容8卷集，实不为过。以探究外国文学经典在源语国家的生成，在译入语国家的传播为主要内容的8卷集，是“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研究”这一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最终成果。“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研究”2010年10月立项，属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开始启动时最早的一批。该项目的最终成果为340万字系列专著，结项之后不久就被列入“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2018年获得国家出版基金立项，2019年4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8卷集面世后，不断斩获大奖：2021年3月，8卷集荣获北京外国语大学设立的全国性外国文学奖“第二届王佐良外国文学研究奖”二等奖；2021年12月，8卷集的“第二卷”，即其中六章由吴笛撰写的古代卷（上）荣获浙江省人民政府第二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023年12月，整个8卷集荣获教育部第九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科学）二等奖。

8卷集之所以能获得学界的高度认可，在于其选题的前沿性与开拓性：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外国文学经典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是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探索世界文学经典的生成基因与传播途径，研究这些经典的生成语境以及在产生、译介和流传过程中发展、变异和成熟，无疑具有重要学术史意义。从源语文化语境与跨媒介传播等方面深耕文学经典的生长，无疑是具有前沿性、开拓性的重要命题。“将文学经典的生成与传播视为一体并置于互动空间来考察，将外国文学放在复杂、动态、多元的独立系统中加以考察，是一个全球范围内全新的开拓性课题，丰富了文学经典和经典生成的理论”（韩骁190）。

8卷集之所以不断斩获大奖，还在于其重要的学术贡献：不仅在理论上对经典、经典性、经典化、经典重读等问题进行了富有创新的研究，而且对跨媒介的经典传播、经典译介等问题展开了系统性的、建构性的探讨，从而拓展了我国外国文学经典研究的疆域。在经典生成研究界面，8卷集聚焦源语国家社会语境、文化传统、审美体验以及科技革命等方面的复合作用；在经典传播研究界面，8卷集聚焦译介转换、文化交流、跨媒介传播、时代重构与经典再生成，勘察文学与绘画、雕塑、音乐尤其与影视等不同艺术形态的相互动态渗透。尤其探析翻译传播和跨媒体传播，强调没有不同界面的翻译，就不可能存在外国文学经典。文学经典正是从不断的多界面翻译过程中获得再生，获得流传。

8卷集独到的学术贡献，更在于首次研究外国文学经典在源语国家的生成在译入语国家的传播，尤其是深度探析外国文学经典在中文世界的传播之多维度关联，将经典的生成与再生作为一个进程，作为一个系统加以深耕，以中国学者独到的学术立场，从国家文化建设的高度来立体审视与系统反思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中的精神基因、生命体验与文化传承。

我国外国文学界的著名学者纷纷高度赞扬8卷集学术价值的丰富性，充

分肯定 8 卷集探索路径的开拓性。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英美文学和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专家、浙江大学聂珍钊教授称赞 8 卷集“是外国文学研究领域一部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学术巨著”（韩骁 188）。西班牙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西葡拉美文学与文学理原理学研究专家、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教授赞誉 8 卷集“是所有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最值得学界骄傲的成果之一，也是改革开放 40 年来外国文学学科最好的成果之一”（韩骁 188）。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人文学部主任、法国文学与翻译学研究专家许钧教授肯定 8 卷集“作为具有理论创新的重大研究成果，是中国外国文学学界独立探索的结果，展现了中国学者的优秀特质”（韩骁 191）。

从外国文学研究者的角度看，8 卷集的学术价值不仅体现于研究主题的前沿性与开拓性，更在于方法论的创新性：更在于其探索路径上的开拓，在于对经典研究路径的深耕。

8 卷集的总主编吴笛在走向这一深耕之追求上有着鲜明而坚定的理念。在“总序”中，吴笛旗帜鲜明地提出走向外国文学经典研究深耕的新视野、新立场、新目标：

外国文学经典研究，应结合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进程、中华民族文化的振兴与发展，以及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的整体发展及其对我国民族文化的贡献这一视野来考察经典的译介与传播。我们应着眼于外国文学经典在原生地的生成和变异，汲取为我国的文学及文化事业所积累的经验，为祖国文化事业服务。我们还应着眼于外国文学经典在中国的译介和其他艺术形式的传播，树立我国文学经典译介和研究的学术思想的民族立场；通过文学经典的中国传播，以及面向世界的学术环境和行之有效的中外文化交流，重塑文化中国的宏大形象，将外国文学译介与传播看成是中华民族思想解放和发展历程的折射。（10）

走向外国文学经典的深耕，不仅需要富有创新性的理念，而且需要方法论上的创新。这一方法论创新主要有几个层面：其一、将对经典的敬畏与对经典的考证结合起来，既坚守“入乎其内”式地“敬畏经典”，又强调“出乎其外”式地“重估经典”。“敬畏经典”意在强调恢复经典的思想尊严、细寻经典的精神魅力；“重估经典”意在强调激活经典的思想命题、开掘经典的精神蕴藏。8 卷集的作者们在吴笛率领下，像考古学家那样下功夫深度勘探经典源语文本，充分发挥多语种优势，积极运用国外最新文献，充分吸收国际学界前沿成果，对外国文学经典的生成要素、建构特征、传播途径、演变过程、潜在影响的内涵而进行全面、深入的探析。正是这种严谨而精细的考证，使得 8 卷集在对外国文学经典的深耕中得以修正多种传统学术观点。其

二，基于经典的生成与传播之间的互动，将经典生成基因的勘探同经典传播路径的考察融为一体，将文学经典的生成与传播作为有机整体。经典在生成的过程中传播，也在传播的过程中再生成。文学经典一旦生成就必然进入对内或对外传播的进程。输出与接受互动，繁衍出全新的文化意义与符号价值，实现“文化增值”。其三，基于不同时代不同国别的文学经典之间的互动、文学与不同艺术之间的互动，8卷集将各个时期的外国文学作为整个文学系统整体图景中承前启后的流动性环节来进行研究，打通艺术门类、国别和时代划分，通过纵横交错的多方位考察，展现出从传统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外国文学经典独特的生成方式，这些文学经典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描绘出历史文化变迁在文学中留下的轨迹与这些文学经典生成后的运行轨迹。

8卷集不再将《神曲》或十四行诗体这些外国文学经典作品或经典文学样式视为不证自明的天然存在，而追问经典“何以生成？”“怎样传播？”围绕着这两个核心追问，吴笛率领8卷集的作者们解析经典作品或经典文学样式的生成基因与生成机制，清理而描绘经典作品或经典文学样式由原生地到次生地的传播路线与重生路径。将经典的生成与经典的传播这两个论题域打通，使得外国文学经典研究得以超越静态的、平面的、单纯的文字文本解读的状态，而进入经典之“进程化”“动态化”“立体化”境界——将文学文本与其艺术“译本”，与其文化密码加以“系统化”——的整合式研究境界。这样一种对经典的生成与生长的深耕，必然会激活经典；这样一种对经典生命的激活，必然有助于整个外国文学研究生存空间的拓展。在工具理性至上的势利社会，在外国文学研究越来越被边缘化的今天，这一由经典研究的深耕而带来的学科空间的拓展，实则具有护卫整个外国文学学科的战略意义。

8卷集在外国文学经典深耕路径上的方法论创新也得到了学界的充分肯定。陈众议称赞8卷集“将文学文本研究置于历史的、跨文化的以及跨文学的语境之中，打开了新的研究视角，让人耳目一新”（韩骁 189）。许钧肯定8卷集“将外国文学经典置于复杂动态多元的系统、历史的进程、多学科互动空间中进行考察这一途径极大地拓展了外国文学研究的空间”（韩骁 191）。王立新看出8卷集“把文本完全纳入生成、传播、接受的场域中，通过生成要素、成型标志、建构方式、演变过程、传播途径、译介转换、当代呈现等七个方面，来阐释‘经典为何’的问题，非常全面、严谨且创新。前三者是对经典之结构的分析，后四者是对经典之所以为经典的变量的动态分析；自体逻辑十分完整”（韩骁 190）。

二、新视界

吴笛领衔完成的8卷集何以取得这些方法论创新？可从不同维度来探析。以笔者之见，深层次的轴心应是贯穿于“三生”研究——经典生成基因之勘探、经典生长路径之考察、学科生存空间之拓展——的“大翻译观”。推

动 8 卷集方法论创新的轴心枢纽实则是吴笛的“大翻译观”¹。“大翻译观”作为一种新视界，在深层统率 8 卷集的总体设计，引领吴笛本人对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的具体研究。吴笛对经典的深耕过程表明：他一直在积极采用其“大翻译观”来探析外国文学经典的生成与再生。

“大翻译观”是对通常意义上“翻译”的超越。“大翻译观”将“翻译”看成几个层面：其一是文字翻译，语言学意义上的翻译；其二是文学翻译，诗学、美学意义上的翻译，不同语言的文学间互动、不同民族的文学间交流；其三是艺术翻译，媒介学意义上的翻译，不同的艺术之间的转换，语言艺术与影视艺术，与绘画艺术、雕塑艺术、音乐艺术之间的转换；其四是文化翻译，符号学意义上的翻译，不同文化文本之间的转换，不同的文化代码之间的破译：编码与解码。“大翻译观”认为，在文学翻译、艺术翻译、文化翻译这些基于语言又超越语言的翻译行为中，总有新的意义得以创生，甚至生成新的文本。

世界文学经典的生成要经由翻译。一民族的文学杰作成为他民族文学的经典，成为世界文学的经典，要经由翻译。没有翻译就没有经典。正是翻译，使得文学文本获得今生之后的“来生”。“文学经典正是在不断的翻译过程中获得再生，得到流传”（吴笛，“总序” 7）。“翻译是源语文本获得再生的重要途径，纵观世界文学史的杰作，都是在翻译中获得再生的。从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希腊罗马等一系列文学经典来看，没有翻译就没有经典。如果说源语创作是文学文本的今生，那么今生的生命是极为短暂的，是受到限定的；正是翻译，使得文学文本获得今生之后的“来生”。文学经典在不断被翻译的过程中获得“新生”和强大的生命力。²

从词源学来看，“翻译”一词来自拉丁文的“Traducere”，即“引向远方”。文学翻译使受到时空限定的文学作品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古代文学经典的生成实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中古波斯的《鲁拜集》（*Rubáiyát of Omar Khayyám*），正是因为有了菲兹杰拉德（Edward Fitzgerald）的英译才引起关注，得以成为文学经典。吴笛在 8 卷集第 2 卷第 9 章对《鲁拜集》的经典化历程，进行了精细的勘探与严谨的考证。这一经典生成于翻译之中，生成于这部波斯语诗集的英译、俄译、汉译。正是有了文学翻译活动，世界文学才得以产生，一部世界文学史其实也是一部翻译文学史。文学翻译在民族文学的跨文化交流中具有“工程师”的地位。只有借助于一种重要的文学语言进行的翻译活动，才可以让他们的文本进入到文学世界之中。³有别于文字翻译，文学翻译具有自己的特质，自己的使命。吴笛在“总序”中有论述，还

1 “大翻译观”意为对狭义的语言学界面翻译观的超越，这里的“翻译”已包含媒介学、符号学、文化学等不同界面的“翻译”，故称之为“大翻译观”。

2 参见吴笛：“总序”，《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研究》第 1 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年，第 8 页。

3 参见卡萨诺瓦：《文学世界共和国》，罗国祥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156 页。

发表专文来阐述：

文学翻译不只是语言文字符号的转换，而且是以另一种生命形态存在的文学活动。文学翻译是一门艺术。译者充当着作家的角色，因为他需要用同样的形式、同样的语言来表现原文的内容和信息。文学翻译不是逐字逐句的、机械的语言转换，而是需要译者根据原作的内涵，通过富有才情的创造性劳动，用另一种语言再现原作的精神和风采。在这里，译者不是“媒婆”，而是生命创造者。翻译过程就是不断创造生命的过程。翻译是文学的一种生命运动，翻译作品是原著新的生命形态的体现。杰出的作品正是在翻译中获得新生，并且生存于永恒的转化和永恒的翻译状态。文学翻译所承载的另一个重要历史使命就是建构翻译文学。（4）

这里讲的已是“翻译文学”。“翻译文学”与文学翻译是怎样的关系？吴笛有辨析：

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是两种不同的视角。文学翻译的着眼点是文本，即原文向译文的转换，文学翻译也是媒介学范畴上的概念，是世界各个民族和各个国家之间进行交流和沟通思想感情的重要途径、重要媒介。翻译文学的着眼点是读者对象和翻译结果，即所翻译的文本在译入国的意义和价值，强调的是接受与影响。与文学翻译相比较，翻译文学不只是词语位置的调换，而是研究视角的变更。

翻译文学是文学翻译的目的和使命，也是衡量翻译得失的一个重要标准，它属于“世界文学—民族文学”这一范畴的概念。翻译文学的核心意义在于不再将“外国文学”看成“外国的文学”，而是将其看成民族文学的组成部分，是民族文化建设的有机整体。可以说，文学翻译的目的，就是建构翻译文学。（4）

文学翻译研究朝翻译文学研究这一转向，意义可谓重大，关乎外国文学学科的境界。正是这一转向的实现，可使我们的“外国文学”不再是“外国的文学”，可使我国的外国文学得以成为我国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此看来，文学翻译家杨宪益所译的《荷马史诗》、罗念生所译的古希腊悲剧、梁宗岱所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季羨林所译《罗摩衍那》《沙恭达罗》、金克木所译的《摩诃婆罗多》、丰子恺所译的《源氏物语》，还有《哈姆莱特》《唐吉珂德》《浮士德》《红与黑》《当代英雄》等外国文学经典的杰出汉译本，作为“翻译文学”，实乃中国现代文学的有机组成。从事翻译文学创作的这些翻译家也是作家，也是中国作家协会成员。吴笛本人出席全国作家代表大会，也是基于这位俄语诗与英语诗杰作的优秀汉译者，这位《苔丝》《罪与罚》等

外国文学名著的优秀汉译者，已是一位作家。

一如外国文学经典的生成需经由翻译，外国文学经典的传播也需经由“翻译”。在漫长的岁月中，外国文学经典经历了多次传播途径，见证了多种语言文字、物质载体、媒体种类的变迁。吴笛将外国文学经典的传播概括为七种形式：口头传播、表演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组织传播、影像传播、网络传播。¹以“大翻译观”来审视所有这些经典传播形式，其实质也是“翻译”。外国文学经典的影视改编，可谓是以文学文本为“底本”的“翻译”；文学作品被改编为绘画作品、雕塑作品、音乐作品，这一跨媒介传播过程，实则也是不同艺术形式之间的“翻译”过程。改编是文学经典传播中十分重要的环节，是文学经典生命被激活而得以再生的重要路径。何况许多文学经典的生命力是在改编的状态中得以实现和完善的。²尤其是银屏形象在展现复杂的事件和情节方面比语言文字更为直观，甚至更为生动。由荷马史诗改编的电影《特洛伊》和《木马屠城》，由《神曲》改编的多种动画电影，显然成功地普及了外国文学经典。跨媒体改编的艺术机制实则也是“翻译”：“将纸上的语言符号转换成银幕上的视觉符号，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转换，而是从一种艺术形式到另一种艺术形式的‘翻译’”（吴笛，“总序”11）。

诚然，这里的“翻译”已是另一个层面的“翻译”，“媒介学”意义上的“翻译”。“媒介学”意义上的“翻译”，其机理也还是翻译。我们也可以且必须遵守翻译的基本原理与机制对跨媒介改编加以研究。一如文学翻译研究中是将忠实原著，尤其是忠实原著的思想内涵，看成是“译本”的不可忽略的重要目标，看成是衡量“译本”得失的重要维度，在对由一部文学经典改编成的一部电影进行探讨时，我们可以原著为“底本”，来探讨影片这一“译本”的得失。在文学经典的影视改编中，既要“以大翻译观”看到改编这种从艺术的一种表现形式朝另一种表现形式的转换实则是“再创作”，无视这一点，影视改编中就会出现文学翻译中的“硬译”或“死译”，也要以“大翻译观”看到这种“再创作”无疑又受到“原文”的限制，视觉艺术与语言艺术有着各自特定的艺术特性与表现技巧，而理应将原著所揭示的道德的、心理的和思想的内涵通过新的视觉表现手段来传达给电影观众。³何况改编者对原著的阐释，作为一种跨文化的阐释，其本身就是一种“翻译”——符号学意义上的“文化翻译”（周启超，“跨文化阐释：路径与机制”177）⁴；改编者的阐释，总

1 参见吴笛：“总序”，《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研究》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5-7页。

2 参见吴笛：“绪论·人类童年的悠远的回声”，《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研究》第2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6页。

3 参见吴笛：“总序”，《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研究》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2页。

4 洛特曼认为，阐释即翻译。对他者文化的任何一种把握实则都是翻译。对这一观点的论述，参见周启超：“跨文化阐释：路径与机制”，《社会科学战线》1（2024）：172-178。

是基于改编者之时空的、文化的“外位性”（周启超，“外位性与文学研究的人文化”132）¹的阐释。在8卷集第5卷第6章，吴笛正是以“改编即翻译”这一“大翻译观”，对电影界曾十分叫好的一次改编中的“误译”——波兰斯基所执导的电影《苔丝》对哈代小说原著的“误译”，进行了精彩的深度探析。

三、新见解

对外国文学应不再是“外国的文学”这一新境界的执着追求，对以“大翻译观”这一新视界来统率“三生”研究——经典生成基因之勘探、经典生长路径之考察、学科生存空间之拓展——这一方法论的坚定贯彻，既体现于吴笛作为组织者对8卷集的总体设计理念，更被落实于吴笛作为研究者在8卷集中所展开的对经典生成与传播具体的深耕，呈现于一系列富于开拓性、创新性的新见解。吴笛参与了8卷集第2卷（古代卷）（上）、第4卷（近代卷）（上）、第5卷（近代卷）（下）、第8卷（当代卷）（下）这4卷共10章的撰写，实为团队主力之一；这一主力地位更体现于研究格局：吴笛是对自古代经近代至现代的外国诗歌经典的生成与传播历程进行全覆盖性勘探的研究者。外国诗歌经典是吴笛多年来用心最勤耕耘最深而建树最丰的领域。通读下来，给笔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亮点”至少有：弗罗斯特诗歌经典的生成与传播，这是对“诗之可译性”之机理与诗在翻译中获得新生的例证；《神曲》的影视改编与跨媒体传播，这是对文学经典在改编中被成功地普及而再生的例证；小说《苔丝》与电影《苔丝》：这是对出色的改编中也有“误译”的例证；玄学派诗歌在17世纪的生成与在20世纪的被激活，这是诗歌发育也受益于自然科学的哺育之例证；《鲁拜集》在传播中经由翻译而成为经典，这是对经典在传播中生成的例证。十四行诗体这一重要文学样式，并不是生成于意大利，而是生成于古罗马，这是对经典生成史进行深度发掘、精细考证，文学考古也会有新发现的例证。限于篇幅，在这里无法全面评述。且驻足于吴笛完成的两个研究个案，它们堪称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研究进入深耕境界的样板。

其一，中古波斯诗歌《鲁拜集》在传播中经由翻译而成为经典。这是经典的生成与传播互动的例证，是民族的杰作经由翻译而成为世界文学经典的例证。海亚姆这位在中世纪波斯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和哲学家，作为《鲁拜集》的作者，其诗人地位何以在七个半世纪之后，在19世纪才得以确立？吴笛对《鲁拜集》的经典化历程，进行了精细的勘探与严谨的考证。这一经典生成于翻译之中，生成于这部波斯语诗集的英译、俄译、汉译过程，生成于直译与转译，全译与选译等不同译本之中。就汉译而言，生成于新诗格律体的翻译与古体诗

1 巴赫金认为，时间、空间、文化中的外位性，是对他者文化进行创造性理解的前提。对这一观点的论述，参见周启超：“外位性与文学研究的人文化”，《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5（2020）：129-136。

的翻译之中。吴笛以其同时精通汉语诗、英语诗和俄语诗而能在多语种的诗歌世界自由穿越的视野与才能，对英国诗人菲茨杰拉德的《鲁拜集》的英译，俄罗斯学者戈鲁别夫（И.А.Голубев）的《鲁拜全集》与自郭沫若以降一百年中国学者、诗人、作家对《鲁拜集》的转译、直译的不同风采，在诗文本的层面，展开精细的比较、层层论证。

吴笛公正地肯定《鲁拜集》俄译本的特色：就其所收原诗的数量而言更为壮观：目前收诗最多的是戈鲁别夫翻译的于2008年在莫斯科出版的海亚姆《鲁拜全集》，共收诗1306首。吴笛有理有据地论证《鲁拜集》英译本——先后5个版本，菲茨杰拉德所译《鲁拜集》虽然只收诗101首，却是真正意义上的创造性翻译（transcreation）。该英译本《鲁拜集》注重体现原文精神内涵，采用翻译、合译、意译、改译，还对原文的排列顺序进行调整，使得诗与诗之间有了一定的关联，这种翻译在意境、意象以及思想内涵等方面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更适合于译入语读者的接受。这种经过再经典化的译作也更适于吟咏和流传。正是菲茨杰拉德翻译的《鲁拜集》得到广泛流传，成为英国文学的经典。通过英语的传播，《鲁拜集》走向世界，成为美国，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文学经典。

吴笛更具体地梳理《鲁拜集》在中文世界的传播路径：《鲁拜集》在中文世界的传播，分为两个类型：一是以直接译自波斯文的作品而传播；二是以从英文转译的作品而传播。从波斯文原诗直译的作品主要在学界流传，影响有限。在《鲁拜集》百年来汉译历程中，有不少较为齐全的译本，还有不少文学家或翻译家对《鲁拜集》进行了选译，多则数十首，少则一两首。这些译者中，有很多是著名的作家、学者、翻译家，其中包括胡适、闻一多、徐志摩、林语堂、刘半农、吴宓、施蛰存、梁实秋、伍蠡甫、郑振铎、朱湘、飞白、屠岸。《鲁拜集》中译本，绝大多数为新诗格律体翻译，也有一些古体诗翻译的实践，如吴宓、李宽容、黄克孙、柏丽、李霁野、江日新、鹤西、睦谦等人的译诗就是用七绝和五绝或五律翻译的。这些译文，各显神通，各具特色，异彩缤纷。《鲁拜集》何以在中文世界受到如此广泛的译介和传播？这既基于其艺术形式与中国译者彼此相通。也是得力于其思想蕴含与中国译者心心相印。鲁拜体这一四行诗体与我国的绝句存在相似之处，鲁拜体的兴起也主要发生在中国唐王朝控制西域中亚地区之后，不少学者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着渊源关系。杨宪益先生就曾撰文，认为鲁拜体的产生有可能受到唐代绝句的影响。《鲁拜集》充满着哲理色彩，并且闪烁着人性的光彩。如今看来，波斯诗人海亚姆的这些诗似乎都不是为中世纪的人们所创作，而是为现代人所写。¹

就这样，海亚姆的《鲁拜集》这一经典的生成与传播历程成为吴笛对经

1 参见 吴笛：“十四行诗的生成、演变和传播”，《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研究》第2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61-175页。

典在传播中生成在翻译中生成这一史实进行考古般勘探的一个精彩样板，成为吴笛展开外国诗歌经典生成机制与传播路径之深耕的一个生动个案。吴笛的这一个案研究证明：文学经典的生成与传播其实是一个有机整体。经典在生成的过程中传播，也在传播的过程中再生。这一个案研究过程表明，吴笛确乎是以考古学者那样的眼力与功夫投入经典生成史的发掘与勘探

其二，如果说《鲁拜集》之经典生成史的考证显示出吴笛对一部文学作品成为经典的勘探力，那么对十四行诗的生成、演变和传播历程的整体性勘察，则展示出吴笛对一种经典的文学样式之生成与生长机制，之发育与发展的机理进行系统性清理的勘探力，而且这一研究还成为“考证性探究”中有所发现，进而得以修正传统见解的例证。

十四行诗体作为一种长久流行于世界文坛的重要诗体，作为许多文学经典的载体，曾经并且依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意大利的但丁和彼特拉克，英国的莎士比亚和斯宾塞，法国的龙萨和波德莱尔，西班牙的贡戈拉，俄国的普希金——这些不同民族文学的代表，其诗歌方面的成就主要是通过十四行诗来体现的。十四行诗已成为一种国际性的跨文化的艺术形式。十四行诗的发展折射了世界文学经典的流传与发展。对十四行诗体的生成、演变和传播作一考证性的探究，并对其在世界各国的传播与演变的历程以及在我国译介和融会进行梳理和研究，对于研究世界文学经典的流传与发展实则具有相当典型的意义。十四行诗体源生于何处？十四行诗产生于14世纪的意大利，这是国际学界主流观点。十四行诗的开创者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诗人彼特拉克，这是在我国学界的流行观点。然而“主流观点”“流行观点”也可能牵强附会，缺乏史料支撑。吴笛经由大量新的史料的考证来实证这一“主流观点”“流行观点”其实言之无据。这一考证有逻辑分层面推进：

第一层，质疑彼特拉克乃十四行诗体开创者这一成见。通过深度考证，吴笛发现但丁已经先于彼特拉克创作了以十四行诗为主体的诗集《新生》，其中收入的十四行诗达25首。在学界通常被认定是十四行诗体最初成就的“彼特拉克诗体”，在结构上与但丁《新生》中的十四行诗体并无明显区别，也是4433结构，前面一组是“八行诗”(Octave)，后面一组是“六行诗”(Sestet)，认为彼特拉克是十四行诗的首创者显然是有失偏颇的。

第二层，质疑意大利乃十四行诗体发源地这一定论。十四行诗的结构是“八行诗”加“六行诗”。考察十四行诗的生成，无疑不能忽略有关“八行诗”和“六行诗”的概念。在具体创作实践中，“八行诗”和“六行诗”即可作为十四行诗体的前后两个组成部分，也可作为独立的诗歌存在。据现有资料表明：八行诗或六行诗先于十四行诗产生，并且影响了十四行诗歌在形式方面的生成和发展；但是反过来，十四行诗歌的流行和普及，又促成了八行诗和六行诗的兴盛。究竟是八行诗和六行诗影响了十四行诗，还是十四行诗影响了八行诗和六行诗？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尚不清楚的问题”。吴笛先是从

文化语境入手，考证出曾经盛行十四行诗的意大利与古罗马文字与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然后从八行诗、六行诗与“十四行诗”共有的核心元素“十一音节律”（*Hendecasyllabus*）入手，考证出古罗马诗人卡图卢斯给后世留下的丰厚文化遗产中，“十一音节律”（*Hendecasyllabus*）是其中重要的一项，而但丁、彼特拉克等一些意大利的十四行诗诗人，所采用的正是同样的“十一音节律”，这样的考证便走向一个发现：十四行诗起源于古罗马，在抒情诗人卡图卢斯的诗中已经有了最初的原型。此后，吴笛分四个方面对古罗马诗人卡图卢斯对十四行诗生成所做出的贡献展开论述，确证了十四行诗体的开拓者原来是古罗马诗人卡图卢斯。

十四行诗的生成渊源发生于古罗马，卡图卢斯的诗集《歌集》在十四行诗得以生成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奠基作用，虽然它只是属于生成的初始阶段，但是其生成阶段的特性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其原始因素极大地影响了其后的传播。13世纪意大利十四行诗的繁荣及其4433形式的确定，则是属于该诗体在传播阶段的演变和衍生因素。后来十四行诗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发展和演变同样是这一传播和衍生因素的延伸。¹

吴笛就是这样以大量的文本考据的方式，确认十四行诗体这一重要文学样式并非生成于意大利，而是生成于古罗马，进而修正了学界主流观点、突破了教科书上的流行观点，使十四行诗体的生成提前了一千多年。

结语

衡量一位大学者的学术建树，也有多种尺度。有以著作等身来评价其学术产量，也有以成一家之言来评定其学术质量。在笔者看来，在学术探索路径上的深耕，在方法论探索上的开拓，给学界以方法论上的引领，功莫大焉。经典研究何其多。以经典研究为论题的著作或许比经典本身还要多。吴笛领衔的以外国文学经典研究为主题的8卷集巨著，之所以出类拔萃，在于其别开生面的方法论创新，在于其将外国文学经典的生成与传播置于多界面的翻译——语言学的、文学美学的、艺术媒介学的、文化符号学的“翻译”——这一“大翻译观”的视界。基于这样的方法论上的新视界，吴笛领衔的8卷团队才得以进入对外国文学经典的深耕，才有可能走向外国文学研究的新境界：使我们中国的外国文学不再是“外国的”文学。置身于新境界，才会有新见解。是否走向这一境界，关乎外国文学学科的命运。对经典的深耕——将经典的生成与传播置于互动共生的系统，将文学经典文本与其跨媒体的改编（“译本”）关联起来加以整体研究，将外国文学经典原著的汉译——文学翻译转向我们的“翻译文学”，既是对外国文学学科生存空间的护卫，更是对外国文学学科疆域的拓展。这样的深耕，真可谓立意高远：对于学科建

1 参见吴笛：“十四行诗的生成、演变和传播”，《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研究》第2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71-298页。

设，实则是具有现实针对性之举，对于国家文化，实则是具有战略意义之举。

Works Cited

- 卡萨诺瓦·帕斯卡尔：《文学世界共和国》，罗国祥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Casanova, Pascale. *The World Republic of Letters*, translated by Luo Guoxiang et al. Beijing: Peking UP, 2015.]
- 韩晓：“外国文学经典研究的跨学科交流：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高层论坛综述”，《文学跨学科研究》4（2020）：187-191。
[Han Xiao. “Interdisciplinary Communication on Form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Literary Classics.”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 4 (2020): 187-191.]
- 吴笛：“总序”，《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研究》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12页。
[Wu Di. “General Prologue.” *Studies in the Form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Foreign Literary Classics* Vol. 1. Beijing: Peking UP, 2015. 1-12.]
- ：“《鲁拜集》的生成与传播”，《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研究》第2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61-175页。
[—.“The Gener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the *Rubaiyat* by Omar Khayyam.” *Studies in the Form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Foreign Literary Classics* Vol. 2. Beijing: Peking UP, 2015. 161-175.]
- ：“十四行诗的生成、演变和传播”，《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研究》第2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71-298页。
[—.“The Generation, Evolu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the Sonnet.” *Studies in the Form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Foreign Literary Classics* Vol. 2. Beijing: Peking UP, 2015. 271-298.]
- ：“翻译在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中的历史使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9月10日，第004版。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Translation in Translation in the Gener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Foreign Literary Classics.”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Today* 10 September 2019: 4.]
- ：“绪论·人类童年的悠远的回声”，《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研究》第2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7页。
[—.“Introduction: Long Echoes of Human Childhood.” *Studies in the Form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Foreign Literary Classics* Vol. 2. Beijing: Peking UP, 2015. 1-7.]
- 周启超：“跨文化阐释：路径与机制”，《社会科学战线》1（2024）：172-178。
[Zhou Qichao. “Approaches to and Mechanism of Transcultural Hermeneutics.” *Social Science Front* 1 (2024): 172-178.]
- ：“外位性与文学研究的人文化”，《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5（2020）：129-136。
[—.“Outsideness and the Humanitarianism of Literary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Journal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5 (2020): 129-136.]